全球化分裂:成因、未来及对策*

李 晓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里,曾经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英国脱欧、高举"美国第一"旗帜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宣布退出 TPP,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贸易战阴云密布……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多以"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予以概括。我认为,这种认知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自 1492 年大航海时代开启迄今,所谓的全球化经历了近五百年的缓慢发展直至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方才达到高潮,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二战后以 GATT(WTO)、IMF 等为代表形成了全球市场规则的统一;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前苏东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所导致的全球市场规模的统一。因此,全球化本身是无法被阻挡的,更是不可逆的过程。我们现阶段所经历的一切,本质上是全球化的分裂。

除了前述几个表面现象之外,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崛起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 G20 力量的日益强大,美国认定它曾经支持并主导的 WTO 规则已对其造成重大的利益损害,必须重新制定并主导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此乃其推动构建 TPP 的重要原因;二是在全球多边贸易安排受阻的情况下,世界性的区域一体化浪潮迭起,相互临近的各国、各地区纷纷试图构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如目前仅在东亚地区就交叉存在着七个区域性多边合作框架(谈判进程),即东盟 10+3 框架、RCEP、APEC、中日韩 FTA、TPP、东盟 10+6 框架、东亚峰会10+8 框架等;三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所形成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分裂,即杜鲁门总统以来所坚持的美国必须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让后发展国家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金融安排获取经济增长收益,借以构建和平繁荣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被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 本研究获得 2015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重大招标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5ZDA017)的资助。

"美国第一"原则打破了,特朗普的频繁"退群"正是这种价值观分裂的反映。这是最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简言之,所谓全球化分裂,就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者共识,而是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金融规则的过程。

全球化分裂当然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但如此认知全球化分裂的成因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些具体论断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基本原理无疑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人们便对"美国衰落"的话题津津乐道,但近六十年来的客观现实显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过于关注这一话题本身,却对决定美国核心利益的经济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很少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直至70年代初的崩溃,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实体经济作为霸权基础或者核心力量的相对衰弱。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后所形成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即"美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特里芬难题"的制约,使得美国走上了凭借债务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道路,不仅美元发行数量激增,金融资产规模迅速膨胀,而且通过1980年底以来一系列的金融规则、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形成了一个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其结果就是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不仅金融业产值远远高于制造业产值比重,金融业利润占整个行业利润的比例也从1960~1984年间的平均12%左右上升至1985~2016年间的21%(最高曾达到31%),美国居民与非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财产性收入和股票、基金类投资收入迅猛增长,同时美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也从"企业社会责任"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等等。

经济金融化与"美元体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进而改变着美国控制世界的方式。首先,金融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一直高达 1/3 左右,因而其收益及其巨大的影响力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其次,资本账户在美国国际收支调整中的地位上升,美元的升值、贬值已不再是美国地位的反映,而是其支配、控制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方向的手段,成为掠夺全球财富的主要工具;最后,由于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约束,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扩张、金融扩张等手段刺激消费扩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现阶段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核心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期条件,任何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探究不过是个伪命题。

经济结构金融化使得美国成为典型的"金融国家",其他国家则基于自身制造业比较优势成为"贸易国家"①。相应地,伴随着美国核心利益的变化,金融业(服务业)及其收益或者影响力成为美国霸权结构的核心或基础。这一重大变化对美国国内政治力量重组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概念,美国经济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第一重"中心-外围结构"是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其主要表现就是中产阶级的破产,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化所导致的资本利益同劳动者收益的脱节、分离,其主要政治后果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第二个"中心-外围结构"体现在"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间不仅竞争空间出现差异,而且竞争规则、相关理念正在发生重大分裂。二战后美国所构建的 IMF/GATT 等全球多边金融贸易安排使得世界经济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几乎所有国家均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结果

① 所谓"金融国家",是指掌握着金融霸权的国家,其本币就是世界货币,其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并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则的能力。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国内的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或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二是指那些制造业发达,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参见李晓,丁一兵. 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与"人民币亚洲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4-18.

^{· 4 · 《}世界经济研究》2018 年第 3 期

便是生产竞争的加剧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危机频发。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美国经济金融化实际上摈弃了传统的"规模扩张"过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结构扩张"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为美国谋求摆脱传统经济危机约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规则即通过货币扩张、资本泡沫刺激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利润边疆的过程,自然,这也是使得经济增长收益更多地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国家、阶层所控制和重新分配,并促使泡沫横生及金融危机频发的过程。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全球化分裂成本或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因而必须客观、冷静地予以应对。

第一,作为一个正处在崛起当中的国家,必须冷静地认知自身崛起的性质。决定中国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对外开放,即通过将中国经济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当中,融入"美元体系"而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空间,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途径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该体系的潜在或显在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崛起的性质抱有理性认知:一方面,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内涵不仅是经济上的,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与经济实力的提升相比,对真正的大国而言,软力量的塑造更为重要。

第二,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不会成为"正常国家",更不会"收缩",这不过是以往"美国衰落"话题的同义反复。根据历史经验与当今现实,美国正在做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更改并引导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不仅要确保自身从中获利,更要遏制"对手"或"敌人"的收益,所以,尽管特朗普暂时中止了TPP,但美国迟早会重新参与或引导TPP的构建,这与其谋求维系盟国关系或改变国家形象关系不大,主要是基于其经济结构及其核心利益的变化;二是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对手"或"敌人",并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软硬力量予以遏制、打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美国的"收缩",也许是正确的。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已悄然进行了十余年,如今已跃然台上,此乃当今中国国际关系中最大的战略变数。自20世纪以来,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已经认定,不允许欧亚大陆上出现可与己匹敌的竞争对手,这类对手的出现不仅会受到周边国家的制衡,而且美国将充分利用这种制衡。因此,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得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但考虑到国际政治竞争与国内政治竞争的性质不同,主要是同质性竞争,因而任何一种形式的均势都无法确保危险状态的形成,诸多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制度竞争,这在全球规则及其共识分裂的状态下体现得更加明显。我们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思考:一是在理论研究上,不应仅仅关注大国崛起的经验,更应着重分析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曾经的"老二"的失败教训;二是在战略考量上,应更多地关注自身崛起,而非国际主导,因为在全球化分裂状态下任何大国都无法提供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或遵守的国际规则,所以应将主要精力关注于国内制度建设,其目标是构建一套可以进行持续性国际竞争并胜出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提高效率、激发活力;三是在具体策略上,应将同美国的竞争关系控制在贸易领域,个别产业部门的贸易竞争或国际诉讼的失败无碍全局,但货币金融领域的竞争涉及全局,且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同美国相比远不在一个层级,故必须尽力避免,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第四,将现阶段对外关系的重心放在周边,全力协调、处理好周边关系。无论是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实力,还是周边一些国家试图凭区域经济合作抗衡中国的企图来看,我们都应将国际关系的重心放在周边。如何管控或尽快消除与周边国家间的各种矛盾、冲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营好周边,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逆全球化"概念辨析与全球化进程的梳理

雷达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发展、变动、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开放的新战略,因此,准确判断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走势和全球经济格局变动的趋势,是中国制定正确的全球战略的前提。其中,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是否出现了逆转?"逆全球化"的概念是否成立?将会是中国对外战略决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在"逆全球化"的概念上,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笔者认为,自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走势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

其一,与危机前相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认同日趋分化并日益严重,如果说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 西雅图会议首次出现的"反全球化"示威,标志着美国国内层面全球化的收益者和受损者的利益诉求的 矛盾;那么,危机之后,在国际层面则明显出现国别之间在对待经济全球化态度上的反差。发达国家在 对外战略上几乎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追求的自由主义,转而越来越依仗保护主义,而新兴的 发展中国家却在危机之后努力倡导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其二,逆全球化现象不仅反映在国别间对全球化的态度差异上,同时也反映在全球化治理方式上出现了逆转的现象,以往多边、全球性的国际协议和机构越来越多地被双边和区域性的协议和组织取代,世贸组织的新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国际货币组织缺乏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新思路与新方案,特别是美国相继退出 TPP、国际气候谈判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三,本轮危机之后,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复苏步伐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样也是国别之间经济变动的非同步性特征的再现,这说明各国之间经济的关联度和相互依存度在下降。显然,这是逆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发展主要表现为各国之间世界商业周期的同步性加强,并由此提出了治理全球性危机的国际协调的要求。

其四,世界经济中三大主要板块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呈现出了与危机前不同的趋势,美国将重振制造业作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向,这种调整就美国国内层面而言,意味着资源从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向不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转移,显然调整的成本是巨大的。而在国际层面,制造业的振兴以及美国人买美国货,促使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改善了,但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带动作用将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再平衡过程中的外部需求下降,作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亚洲主要国家的调整只能转向服务业发展,但是,由于亚洲服务业在世界范围中并不具备比较优势,亚洲服务业的增长只表现为非贸易部门产值和需求增加,从2008年以来的经验数据来看,外围国家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无法替代中心国家实物需求增长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的。而欧元区经济体在主权债务危机的调整中逐渐形成了区域内的"中心—外围格局",区域内贸易的增长超出了区域外的贸易增长。因此,危机之后全球经济

再平衡的调整,结果是强化了区域内的自循环,削弱了三大板块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而从阶段 性趋势看则呈现出逆全球化性质。

其五,正是 2008 年危机后各国的反危机与再平衡政策调整的逆全球化性质,导致了 2012 年之后连续 5 年世界贸易增速低于全球 GDP 增速的现象。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的复兴和繁荣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期间的绝大多数年份,贸易的增长一直领先于世界产量的增长。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 2012 年之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的确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发展轨迹。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确存在着阶段性的逆全球化的变动趋势,因此,笔者认为,作为世界经济格局变动的时代特征描述,逆全球化的概念是成立的。其含义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各国内外部经济战略的调整与危机前的全球化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其二,这种逆全球化战略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逆全球化的实质效应。

"逆全球化"概念成立的一个前提是承认国家层面的对外战略是能够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 我们说 2008 年之后, 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调整是"逆全球化"的, 那么, 与此相对应, 危机之前这些国家 的对外战略总体上讲是顺应全球化的战略, 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战略调整是不断地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 展。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可以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战略的调整中梳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

经济全球化尽管在学理上缺乏统一的定义,但较为一致的共识是要素的全球流动所产生的全球资源配置的效应。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不考虑 2005 年之后的格局变化),即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 1958~1960 年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出现以后。第一个阶段可视为是贸易国际化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金融国际所带动的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的开启时代。

如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角度来认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它是一个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所建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在这种持续中,贸易的自由化秩序需要用资本跨国流动的管制来维护,同时,那个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应的国内经济制度也是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通常把那个年代称为是"内含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时期,以此来对应后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时期(Neo-Liberalism)。那么,为什么资本控制加贸易自由的"内含自由主义"能成为当时普遍接受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内容?

首先,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符合当时西方国家通过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因此,在国际层面通过合作创造出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符合当时世界经济参与国的共同利益。因此,以贸易自由化为优先目标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必须解决关税壁垒、国际支付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的复兴和发展。这三项任务分别对应当时的 GATTS、IMF 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组织来协调。其次,资本管制作为各国的对外政策手段,当时被普遍接受的原因在于多数国家普遍担心资本,特别是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会干扰各国正在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同时,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的主要设计者,凯恩斯和怀特也担心短期资本不受约束的流动会影响汇率的稳定,进而影响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最后,当时也有对资本流动的例外要求,这种例外要求在理论上主要来自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阵营,除此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两大利益集团是反对资本管制的。其一,英格兰银行担心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会导致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弱化,主张战后应该建立资本流动的国际经济秩序,但是,英国本身在当时无力推动资本流动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市场对英镑的信心受挫,一旦实现货币自由兑换,英镑的币值无疑会下降,伦敦的金融地位同样难以维持;英国经济受战争破坏严重,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货币自由兑换将会使英国经济面临外部不平衡的限制;英国在战后复兴过程中依赖美国贷款,因此在国际秩序的建立

问题上必须和美国保持立场的一致。其二,美国虽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国家,但是美国国内的商业银行家和美联储官员都希望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然而,当时如果资本不加限制地自由流动,结果一定是资本由欧洲流向美国,造成欧洲经济的衰退和支付能力的不足,这对美国商品的输出是不利的,会影响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显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初期,美国的对外战略更多考虑的是美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将银行资本的利益放在了次要地位。

欧洲货币市场和欧洲债券市场产生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使作为美元的货币有了投资的需求,这是一个纯粹的自发产生的市场,它的发展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逻辑。那么,这样的市场在"内含自由主义"的国际环境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我们主要从美国的顺全球化自由主义战略调整谈起,因为美国所经历的过程比较完整且具有自主性,而其他欧美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其金融自由化的调整均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或具有外生性特征,或只是出于阶段性目的。

美国对这个离岸美元市场始终是支持的,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其支持的战略出发点有所不同。在 最初阶段,非居民持有的美元有了离岸储蓄和投资渠道,减轻了非居民用美元兑换黄金给美国带来的外 部压力,同时,离岸金融市场与在岸金融市场是可以通过资本账户的管制而分离的,离岸的自由市场可 以满足银行资本的利益追求,而在岸的管制金融能保障政府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美国并没有对美 国银行的离岸分支机构进行任何干预,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在岸市场资本账户的管控。而到了20世纪 70 年代,随着离岸市场规模的增大,美国资本管制的成本越来越高,加之国内资本账户的管制不仅限制 了在岸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同时也限制了美国产业资本对外投资的扩张步伐,因此,国内存在着支持放 松管制的政治基础。随着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通胀形势日趋严峻,美元和黄金 的固定汇兑比价难以为继,特别是在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当局必须跟随美 联储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这些国家会面临本币高汇率所带来的出口萎缩和高利率造成的国内紧缩的 双重压力。而跟随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实际上是美国通胀的对外输出,因此,美国选择浮动汇率和放 松管制的金融自由化调整,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美元在金融自由化的环境中行使着"结构性权 力"(Structure Power)。20 世纪80年代,由于美国放松管制的金融自由化方向的调整,使非居民持有美 国国债的比重增加,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不依赖于美国本国的居民储蓄,金融自由化并不影响美 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为吸引离岸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向美国,1981 年美国实施了国际银行便利 (IBFs)措施,尽管这是美国的一项自主金融自由化开放的措施,然而它对全球金融自由化调整的趋势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不仅体现了美国金融自由化调整的成功经验,使外围国家纷纷效仿美国的金 融乃至整个经济制度,同时,美国国际银行便利措施的实施,形成了全球范围对金融资源和权利的争夺, 欧洲一些对金融自由化还存有疑虑的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也竞相采取了自由主义的金融开放 政策。这一过程就是国际经济秩序由"内含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过程,同时,国际资本流 动的自由化所带动的要素全球流动加速,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增速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全球性投资、并 购高潮的出现也都与金融自由化的开放进程在时间上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上一轮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战略调整是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逻辑的。由此推论,目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的现 象必然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又一轮否定和反思。

当前态势不是逆转,是重构

佟家栋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既有了理论基础,又启动了多区域的实践。突出的表现是,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任伊始便退出了前任总统草签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随后又退出世界气候公约,强调"美国优先",以保护主义为标志的现代孤立主义成为美国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准则。在英国,2016年5月的公民投票,英国人选择了脱离欧盟,以追求英国利益最大化,选择独立自主的发展。在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大选中,反全球化的政党选票明显增加,对欧洲一体化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似乎在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发起者和推动者的国度掀起了逆全球化的浪潮,以致于人们担心,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潮的第二次全球化即将走向逆转,形成经济全球化的转折,从而使经济全球化中断。笔者强调,当前显现的经济全球化逆转,只是经济全球化调整过程中的重构。

一、经济全球化的第二波及其影响

经济史学家们将经济全球化概括为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端于 1820 年前后,基本的标志是大宗商品的国际统一价格已经接近形成;结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有实力的欧洲大国争夺势力范围,以便控制更大的市场和工业原材料来源地,带来了全球化的中断。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 1950 年,新的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乃至协调各国关系的组织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国际贸易,乃至国际投资、国际资本流动已经形成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标志。跨国公司成为推动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和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动力。跨国公司根据全球地理、资源、劳动力成本、市场便利以及市场需求规模和潜力的标准,将整个生产阶段布局到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经济学家杰佛里·威廉姆森对全球化影响的研究表明^①,按照艾里·赫克歇尔和伯蒂尔·奥林要素禀赋论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商品贸易不仅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还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他的基本观点是,自由贸易会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普遍上升,而发达国家由于进口廉价商品,使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商品价格下降,进而国内同行业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形成对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的负面冲击。如果存在跨国的劳动力流动,被进口商品挤出的劳动力就会流出该国,向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国家流动。但是,当劳动力价格上升的水平尚未达到资本比较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价格下降后的水平时,劳动力向国外流出的情况就不会发生。因此,国际贸易在推动商品价格的国际均等化后,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会趋向发生。但是,如果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没有向其他国家流动,那么,国际贸易所导致的不仅是要素价格均等化,还会导致进口国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减少或者失业的增加,进而是劳动力收入水平的下降。威廉姆森运用19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次浪潮的统计数据

① 杰佛里·威廉姆森. 全球化与不平等 过去与现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后期的比较.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系列论文第 5491 号.

展开的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同一商品价格在不同国家之间的逐步接近,导致了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下降和就业机会的减少。同时会发生局部的劳动力流动。然而这种流动只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特别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流动没有发生。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浪潮再次掀起,美国的一些学者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估计此次全球化浪潮对美国国内工资水平和就业的影响。他们认为,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以及与进口竞争的制造业相关的非贸易部门的就业都会产生总体上的负面影响。当然,这种负面影响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进口冲击带来的就业机会的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流出的规模不够大,以致难以抵消就业机会减少带来的失业水平的上升。由此推论,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总体上是负的。

二、经济全球化是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结果

20世纪末21世纪初所发生的经济全球化,从根本上说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企业或公司内部的生产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布局到全球各个存在潜在成本优势或竞争优势的国家或地区,这便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将制造业的一些加工、装配等环节移出母国,转向东道国,由此带来了所谓的实体经济部门在发达国家的"空心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升,从而失去了生产制成品的成本优势,迫使跨国公司在国外投资的经济(预期利润率高、市场潜力或规模大等)、政治(欢迎外资进入、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等环境相对较好的情况下将一些产业部门迁往国外,从而形成了产业的空心化。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就业机会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结果,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制造业的空心化是这种调整的表现形式。

三、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和脆弱复苏的过程,引起各国政府和国民的认真思考。在美国,明确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唐纳德·特朗普上台执政,随后推出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政策措施,意大利主张支持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政府下台,法国大选中反全球化候选人的得票率增加,德国支持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候选人的得票率下降,诸如此类现象都表明在全球化发展中来自相反的作用力,反全球化成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力量,逆全球化已经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出现并且付诸行动。从根本上看,在跨国公司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它们所引导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导致就业机会的全球化,给母国本身带来了就业机会的负增长,特别是当本国已经失去就业机会的劳动力不愿意流动到其他国家或因为生活条件的差异不愿意移出本国时,这些降低了收入,甚至失去了就业机会的劳动力或选民就会转而支持反全球化的候选人上台,以便拿回自己的就业机会,并以此获取高收入的机会。特朗普总统就是顺应了这样一些民意当选并坚决付诸实施逆全球化政策决策的典型代表。由此,人们对逆全球化的担心普遍增强,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在于世界经济本身,而在于各国经济政策方向的差异,从而形成或人们担心形成走向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逆转为碎片化的"以邻为壑"。

四、是全球化的调整,而不会逆转

特朗普上台伊始,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区,搁置或重谈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强调在国际关系中的"美国优先"。尽管这些选择凸显出美国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但是在尚未找到解决美国就业,进而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美国政策的出台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中的调整,希望通过这种调整,缓解美国各生产要素、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对立。

然而,从美国内部看,调整这种关系需要多方面的条件。首先,美国的就业问题不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更多地根源于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长期的低迷增长,难以激发企业在国内投资的积极性。只有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对高成本劳动力的需求,进而用人工智能替代人工在特定生产环节的就业,才

能够为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创造条件。其次,美国制造业的升级必须建立在与世界其他国家产业合作、分工和贸易的基础上,所以特朗普总统还是坚持要双边合作,要互利。从长期战略来看,美国不能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因此,特朗普执政以后,尽管以打击和报复相威胁,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互利合作的贸易乃至经济合作关系。

从全球看,支持和推动全球化已经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尽管出现了"英国脱欧",但是,欧洲团结一致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支持全球合作的意向是明确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收获颇丰,它们从全球化中得到了工业的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加、经济总体实力的增长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它们支持经济全球化。因此在当今世界,尽管一些国家在谋求一国内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经济利益的平衡,但是,伴随经济的恢复,国与国之间的某种经济利益调整将被相互合作带来的快速增长所替代。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不仅给人类带来消费利益的分享(分享经济),更能带来以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人类追求物质和非物质财富增长与福利水平提高时,这种全球化的调整才会结束,随之就是经济全球化更大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没有逆转,也不可能逆转

庄宗明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本文认为,当前由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调整所出现的一些反全球化现象,其本质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利益博弈,它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没有逆转,也不可能逆转。

美国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但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一再强调美国优先,并且相继推出贸易保护政策、减税政策,退出 TPP,要求重新谈判制定双边贸易协定以替代多边贸易协定,甚至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等,这些行为对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从而引起人们对经济全球化前景的担忧。

判断当前经济全球化是否逆转,首先要明确经济全球化的涵义。长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的涵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仍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知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一是"全球化"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民族等各个方面,而其中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而其中最直接、最重要和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是贸易自由化;三是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融合发展,使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一个长期过程;四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世界市场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越是发展,越是需要制定各国必须共同遵守的世界市场规则,以规范世界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正,保证世界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和维护各国在参与世界市场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平等地位和合理利益;五是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具有较大差别,因此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程度会有所差别,而各国在世界市场规则制定和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的话语权将直接影响本国的利益。

基于这样的理解,当前经济全球化是否逆转了呢?

先看世界贸易方面,尽管 2012 年以来,受世界经济增长低迷的影响,世界贸易增长连续几年放缓,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17 年世界贸易已经出现较好的增长势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较 2016 年增长了 3.6%,远高于 2016 年 1.6%的水平。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预计,2018年世界贸易将继续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联合国贸发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2012 年以后一直处于缓慢增长状态,2017 年甚至大幅下降了 16%,但下降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FDI 仍然保持小幅增长,特别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FDI 流入量占世界 FDI 流入量的比例从 2016 年的 25%上升到 2017 年的 30%,中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 FDI 流入量分别达到 1440 亿美元、859 亿美元和 580亿美元,中国的 FDI 流入量 2017 年达到历史新高,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 FDI 流入国。同时,联合国贸发会预测,由于全球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好转,2018 年全球 FDI 将出现较快增长,达到近1.8万亿美元。

在金融全球化方面,这一波反全球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特朗普上台以来推行"美国优先"和反自由贸易政策引起的,而金融全球化是直接有利于美元霸权和美国利益的,目前在金融机构全球化、金融业务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全球化方面还未见特朗普推出直接的反全球化政策。当然,对于更好地服务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所必需的非美元霸权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全球性金融监管与协调,美国必然是消极应对并力图起阻碍作用的。

总的来看,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更合理配置形成跨越国界的生产组织,从而更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生产设备、科学技术和人类劳动,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并通过国际贸易,满足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愿望。经济全球化使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增加了全世界的福利总量,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将使世界人民共同受益。

当然,经济全球化只有在公平合理的世界市场规则与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才能得以顺利运行和健康发展。由于公平合理的世界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直接影响到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各国政府必然争取尽可能地参与或影响世界市场规则的制定,或通过本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一国特别是具有经济霸权的大国为了本国的或国内某些经济集团的利益采取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反全球化的对外经济政策,破坏原已建立的得到多数国家认同的世界市场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阻碍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损害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必然会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在刚刚举行的2018年春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政府的反自由贸易政策已经受到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大利总理真蒂洛尼、印度总理莫迪在内的美国盟友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会者的质疑和反对。特朗普的政策只能导致美国的孤立,阻挡不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中共十九大在客观分析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正确判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共十九大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对许多国家而言,中国已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投资国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

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项合作得到迅速和稳定的发展,人民币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正越来越走近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出现的一些反全球化现象不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不可能逆转。

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的退潮?

张礼卿

作者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近两年来,从英国"公投"脱欧,到特朗普政府上任后退出 TPP 谈判、加强移民限制和不断通过增收特别关税等手段实施贸易保护,再到欧美地区日趋严重的民粹主义升级泛滥,使很多人担心经济全球化逆转。然而,一些关键的数据显示,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已经陷入低潮。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9~2015 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速仅为 3%,2016 年更是仅为 1.7%,远低于 1990~2008 年的年均 7%。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自 2012 年起,国际贸易增速连续五年低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据麦肯锡国际研究所提供的数据,2007~2016 年,全球资本流动规模从每年 12.4 万亿美元急剧减少至4.3 万亿美元,降幅高达 65%(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7)。再有,尽管不一定是健康的表现,但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产物,全球经济失衡近年来也明显减缓,中美两国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的比重均已回落至 3%以下。

经济全球化陷入低潮决非偶然,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第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缓慢。2011~2015年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速仅为1.62%,远低于1999~2006年的年均2.62%,陷入所谓的"持续低速增长"(secular stagnation)。进入2017年,欧美经济出现了较强的复苏迹象,但总体上仍然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如同历史上屡次发生的情形一样,在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失业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的环境下,加强贸易保护总会很自然地成为一些国家的优先政策选项。

第二,当经济全球化不断走向深入以后,其对效率提升的积极影响开始减缓,而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逐渐强化,从而引发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根据 Hakobyan 等(2016)的实证研究,NAFTA 给美国带来的整体福利的提升仅为0%~0.2%,但是,受影响最明显的若干产业的工资增幅则下降了1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在欧美发达经济体具有代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劳工对自由贸易的抵触情绪不断上升。而这种对经济全球化的抵触又与不断升级的民粹主义思潮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和自我强化。

第三,全球治理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要求参与国在一定程度上让渡本国的经济主权,而且伴随着其深入,让渡的程度也需不断提升。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形并不容易实现。事实是,当商品、资本乃至劳动等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或比较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时,尽管有G20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存在,但各国在财政货币政策、监管制度和国家治理等方面依然保持高度独立。很多冲突甚至危机就来源于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作为区域性全球化的一个生动案例,欧盟在实现要素自由流动

和货币一体化的同时,却未能在财政政策和银行监管领域实现趋同和协调,因而在几年前酿成主权债务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粹主义思潮。

第四,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衰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实力和意愿均明显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作为超级经济强国,在享有经济和金融霸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帮助世界市场出清和维持全球金融稳定的责任。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结构性失业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民粹主义泛滥。面对这样的困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高举"美国优先"大旗,退出TPP谈判和"巴黎气候协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甚至多次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从多边主义立场的节节后退,已经并将继续严重制约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展望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上述因素仍将在较大程度上存在,所以经济全球化在短期内重新驶入快车道的可能性不大。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其一,继续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切实降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努力提升内需(特别是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度。为了提升这一转型的效果,应继续实施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努力降低企业的整体税负水平,加快金融市场改革,以便促进国内投资的健康发展。同时,应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提升消费。

其二,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汽车等制成品的进口关税,大幅度减少外商进入金融、电信等服务业的投资限制。开放市场可以促进竞争,提升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和升级,这已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所证实,也是我国这些年所获得的开放红利。在经济全球化处于低潮的时候,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原先开放相对不足的服务业,不仅符合我国自身利益,而且也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捍卫与有力推动。

其三,采取必要的反制裁措施,及时应对一些国家对我国产品出口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今年1月,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宣布,将对进口太阳能板和大型家用洗衣机分别征收30%和20%的关税。近日,美国商务部又提出,已完成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市场调查,并建议对其分别征收最高可达53%和23.6%的高额关税。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大多针对中国,将对我国有关企业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些,有关部门除了利用世贸组织等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外,还应采取必要的报复性措施来予以抵制。

其四,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投资和经贸合作。"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倡导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框架,涉及欧亚非地区65个国家,44亿人口,经济总量超过20万亿美元。当前,以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但各种区域化进程则不断涌现和发展,区域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而且也是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走出低潮的重要抓手。当然,为了确保"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合作的可持续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坚持商业原则,切实做到风险可控。

其五,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为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创造制度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均为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框架,对于经济全球化理应具有支撑作用。但是,在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之后,这些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其他主要成员国的代表性。中国应继续推动这些机构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力求在这些机构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从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球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也应积极推动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兴发展银行的建设,以补充现有多边国际金融组织在可利用资源方面存在的欠缺和不足。

参考文献

- [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The New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ugust, 2017.
- [2] Hakobyan, Shushanik, John McLaren. Looking for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NAFT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6, 98 (4).
 - · 14 · 《世界经济研究》2018 年第 3 期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美、中、俄大三角的特点

程伟

作者单位 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

深度理解经济全球化,必须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笔者曾在一项研究成果中提出,对于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是物质前提,国际贸易是先导,资本国际化是重要推动力,跨国公司是主导力量,经济金融化是催化剂,网络化是技术平台,国际协调机制是保障手段。然而,这些不过只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属于技术分析层面上的因素,充其量只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或者质的规定性,需要沿着制度分析的线索去寻找。我们看到,中国、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其他成员国、东欧等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体制转型的新实践,彻底摈弃了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显然归属于制度层面的巨大变革,在事实上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充分条件。基于这一基本事实,笔者始终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在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中得到采纳和应用,进一步说,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同质化进程。

西方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背景下,不仅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胜利,还看作西方"民主社会"基础性制度的胜利。就现实而言,尽管经济维度之外的全球化,如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等尚未出现,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看来,业已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势必将为多领域、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化与升级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而对于经济全球化引领者和主导者的美国来说,从逻辑上推论,它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将不断得以强化,美国单极主导世界的阻力将趋于减弱。

当然美国也认识到,尽管中国和俄罗斯两个转型大国已经走上市场化发展之路,但并不等于从此就将对美国俯首称臣,中俄仍将是美国潜在的挑战。鉴于此,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对策是,继续挤压它的战略空间,因为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被认为主要限于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而对于经济体量日益变大之态势无法改变的中国,美国则采取经济上接触、政治上将中国全面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策,以此实现美国的两点战略预判:一点是,中美两国经济上的接触虽然会使双方都获得绝对收益的提升,但美国从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定会大于中国;第二点更为重要,即通过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必将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外交乃至文化等诸方面都朝着美国所乐见的方向发展。

然而,经济全球化迄今的演进结果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企盼相去甚远,甚至在许多方面与其原来的预想不仅不一致,而是完全相反。最明显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改革开放与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其社会制度以及价值取向越来越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而是越来越本土化,即中国化。最近一个时期源自西方世界的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有各种的原因,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与出现了诸多不为西方社会所乐见的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结果有关。

冷战时期曾经有过美、苏、中大三角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政府为了集中力量抗击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对中国主动示好。中国也从国家利益以及对外战略需求的综合考量出发,与美国相

配合,较为顺利地实现了中美邦交正常化。进入冷战后时代,尽管美国对中俄未来存在挑战的可能性一直保持着警惕,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至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也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国家实力特别是军力的较快修复,更没有预判到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主要对手的过度靠拢。也就是说,美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冷战后时代,又是在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竟然旧剧重演,美、中、俄大三角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必须看到,大三角的再现并非是历史事件的简单重复。今昔比较,当下的美、中、俄大三角具有一些新的特点,这里只着重指出以下两点,

其一,如果说过去大三角视域下是美国老大与中国老三联手抗击苏联老二,那么今天的情况则是,中国老二与俄罗斯老三联手反抗和制衡美国老大。我们不否认特朗普曾经有过"近俄远华"的意图,但从美国国内建制派坚决抵制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日益巩固来看,美国倒转尼克松战略的可行性,即美国老大联手俄罗斯老三抗击中国老二的可行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基本上不存在。过去的美、苏、中三边都是敌对的关系,而现在的美、中、俄三边关系大有不同,其中的中美、俄美关系稳妥地说是非敌非友,而中俄之间几乎是接近盟友的关系。作为老二和老三的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制衡作为老大的美国,必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美、中、俄大三角博弈中的常态。

其二,冷战时代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现在是中国。乌克兰危机以来,美俄关系极度恶化,甚至军事对峙日趋紧张,以至于有舆论认为美俄之间正在出现"新冷战",似乎美俄较量是主要矛盾。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今日的美、中、俄大三角中,美国视中国而非罗斯俄为其最主要的对手或者战略竞争者。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更多考虑的是立足长远的战略谋划,讲究策略,暗中发力;而在处理与俄罗斯的矛盾与冲突时则少有顾及,较劲儿也往往表现在台面上。还需看到的是,与过去美苏在经济上完全隔绝不同,几十年来中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高度融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构建命运共同体即使可能,但也是遥遥无期,然而在经济层面,中美事实上则已经形成了谁都难以离开谁的利益共同体。可以认为,相对于美俄关系,中美关系要复杂得多,前景充满变数。

最后,笔者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如果说冷战时代的东西方关系是经济政治化,那么,在业已过去的二十多年经济全球化兴盛时期,我们似乎看到了东西方国家关系政治经济化的主旋律。然而,近年来又呈现出朝经济政治化反转的态势。对于这样一种变动周期,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深入研究。

第二,冷战后时代,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在不断推进,各国各地区的经济交融在加深;另一方面,新问题新矛盾乃至新对抗在国际关系中也日益凸显。究其缘由,这是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尤其是与大国博弈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一超独霸是美国的一厢情愿,虽然曾经是客观事实,但不可能持久; 美中 G2 两强共治,理论上可以是一种选项,但现实中行不通;那么,美、中、俄三雄主导是不是未来一个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方向,这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三,中国要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巩固、发展、扩大优势,固然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但最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即不仅把自己做大,更要把自己做强。在国际舞台上,到任何时候,归根结底,还是要靠强大的实力来说话。

美国退群减税将对全球化经济制造扭曲

张幼文

作者单位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从特朗普竞选总统到就职后反复强调"美国优先",再到一年内推出减税政策、贸易保护政策和退出 TPP 等一系列退群行动,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新政府的立场正在全球化经济中制造扭曲,从而对世界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全球化从贸易自由化开始,进而发展到生产一体化和金融国际化,其经济学意义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比国际贸易更为深刻和广泛。生产一体化即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全球资源配置,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全球化。贸易日益增大的比重成为投资的结果,金融直接或间接地支持着投资贸易的全球化过程。尽管目前并非所有国家所有部门都已实行零关税和市场无限制准人,但全球化的整体趋势表明,世界正不断走向一个开放型体系,商品与要素高水平自由流动为整个世界经济带来更高福利。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具有高效配置资源的市场体系,政策干预的结果必然是带来扭曲,从而使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因而美国政府的新政策也必然产生扭曲效应。贸易保护使国外高效率企业产品受阻,国内低效率企业得以发展;中间产品增税提高了最终产品成本。在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生产的企业回到美国只能使用较高成本的美国劳动力;海外盈利的企业因税负低而将利润汇回美国投资,接近市场或供应链的企业回到远离市场和供应链的美国;等等。这些做法可能因减税而使美国企业依然获利,但他国产出减少,世界整体受损。即使减税和吸引利润汇回刺激美国经济达到了更高增长甚至提高政府收入,但世界整体福利依然会下降,因为美国这样实现的增长是以政策引致性扭曲及世界范围资源不合理配置为基础的。

美国从原来积极推动全球化到今天带头实行保护主义,在全球化中收缩,并不是说美国原来不自私而现在变得自私,而是源于全球化不断深化后收益分配表现的隐性化和机制的复杂化。在以国际贸易为主的世界经济中,分工提高了效率使各国都受益,同时贸易差额又比较直接地体现了利益的不平衡,即顺差国更受益,包括本国的资本和劳动都受益,而逆差国则反之,资本和劳动都受损。以贸易自由化为基本内容的全球化利益分配机制就是如此。但是,当全球化进入生产一体化阶段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际直接投资就是资本从母国流到东道国,这时母国的资本因为生产扩大而受益,而劳动则因为资本减少而受损;东道国则相反,资本因更有竞争力的外来资本的竞争而受损,劳动则因更多就业机会而受益。在美国制造业外流就业减少的同时,恰恰就是美国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巨大收益。美国从投资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不断在其海外企业中积累,也意味着美国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然而在统计的表现上却是新兴经济体的高增长和美国的高失业,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的不断加速,基础设施的不断进步,这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和基础设施陈旧形成鲜明对照。事实上在新兴经济体的快速进步中,外资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而增长的更重要来源则是本国闲置生产要素被激活和动员起来进入生产过程,即要素总投入的提高。中国高速增长的根本秘诀正在于此,而绝非由于美国资本的让利或中

国靠不遵守世贸组织义务而得益。

除了国际直接投资导致母国收益隐性化外,贸易收益的表现也因为投资而被复杂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来自于美国在华投资企业,也有其他国家的中间投入,但集中表现在来自像中国这样的最终产品出口国的对美顺差上,美国等国家的投资收益内嵌于中国的贸易收益中,若仅看贸易逆差美国似乎反而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

美国自全球化中的收益更多集中在金融部门。发达的金融产业以及美元的国际地位使美国可以从全球实体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美国金融市场集中了全球资金,创造着美国的高端就业与收益。美国服务贸易的巨大顺差表明,其在高端服务部门中具有强大的优势,也从世界各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陈旧的基础设施,空心化的传统制造业,一个时期内较高的失业率,掩盖了美国从全球化中广泛受益的事实,事实是美国国民的财富在持续增长,企业在海外,但美国却持续享受着资产的增值。美国的问题不在于没有足够低的税收把海外资本吸引回来,而在于能否控制来自全球的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使资金能更有效地与美国的最大优势即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在创新产业中形成新的增长点,这正是美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而传统制造业的回归恰恰不可能重建美国的比较优势。减税政策能刺激企业,但却改变不了美国的劳动力高成本劣势。基础设施的老化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财政能力的不足(这又与美国错误的国际战略相关),也包括社会资金的过度脱实向虚(金融危机的成因)。自身发展模式的调整是解决美国当前问题的关键,而不是靠发起一轮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海外资本和本国资本回流为手段,这一手段只能是以更多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本国利益,因为它扭曲了全球化。事实上美国并不缺乏资本流入,冷战思维和所谓国家安全考虑使其抵制了外来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在各类多边国际合作中的收缩同样是一种扭曲全球化的行为。多边国际投资贸易自由化组织创造的是更大的资源优化配置市场,而双边贸易投资协议则会在创造新的贸易投资的同时带来转移,抑制了更合理的贸易投资布局。因此美国退出多边而倾向于双边利益交换,同样将制造上述扭曲。

新兴经济体的激励性开放政策与美国扭曲全球化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开放初期新兴经济体普遍采用对外资的激励政策,这是因为其投资环境相对于发达国家要差些,政府公共服务不足,市场机制不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差等,政策优惠的经济学意义是通过补偿消除市场不健全的扭曲,这与美国发起的国际税收竞争是不同的。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及时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是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从市场开放度来讲,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可能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但这与美国制造扭曲是不同的。 一方面,激进的开放保持了竞争力较低市场的稳步发展从而更有利于世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化 正是一个不断消除国内扭曲的过程。

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孙 杰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尽管反对和质疑之声始终伴随着这一轮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不能再无视逆全球化的动向。它不仅是两个世界主要国家投票的结果,而且正在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政府行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是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化高速扩张后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过程,至少经济全球化水平不会发生大的逆转。

一、全球化进程放缓的原因

2013 年麦肯锡的一篇报告就已经发现了金融全球化明显放缓,2014 年 4 月 7 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题为"逆向全球化"的文章更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逆转。但是,逆全球化问题真正受到关注还是源自特朗普提出退出 TPP、联合国和 WTO,明确要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将工作带回美国,甚至修建美墨边界墙以及移民和难民限制等政策带来的强烈冲击。

本轮全球化浪潮兴起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名为和平红利,实为发达国家试图倚仗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全球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占领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曾被视为美国化。但恰逢此时,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幅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崛起也被公认为得益于全球化,结果全球化已经不能再等同于美国化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相对实力下降,国际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西方国家一方面指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搭便车,不遵守国际规则,进行不公平竞争,这表明了它们对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实现崛起的复杂情绪;另一方面,它们先是试图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拒中国于国际社会之外,此后则索性转向逆全球化。

二、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

全球化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早在 2003 年,斯蒂格利茨就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当时他已经指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 IMF 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全球化就是要把"华盛顿共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警告这将引发种种恶果。应该看到,斯蒂格利茨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全球化,因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方式。

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才是最大受益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些回报大都被金融寡头和精英所攫取,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遍提高国内各阶层的福利就需要分配制度的保证。因此,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又出版了《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一书,专门讨论了这些被传统实证经济学忽视的规范问题,可惜多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等"旧经济部门"的蓝领产业工人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结构性失业,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持续加剧,进而对政治和商务精英产生深深的不信任。这些因素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也有类似情况。但是,美国贸易优势并不在于普通制造业,这些部门的盲目回归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原理,也不符合美国

的利益。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失业是经济模式转型造成的阵痛,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不能单纯指望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得到解决。底特律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推进国内改革,特别是下大力气办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简单地把就业带回美国。这样做不仅不会使美国再次强大,而且会使美国进一步衰落。

三、逆全球化不会长期存在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的优势更在于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特朗普执政以后收紧移民政策,给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恰恰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即使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和蓝领工人的生活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也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如果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不讲贸易优势,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物价也会上升,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下降。

最重要的是,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经历说明,没有人能够幸免于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孤立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们还是应该看到驱动全球化的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逆全球化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这个逻辑上说,逆全球化要能持续,就需要避免出现这种不利的局面,而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造成的成本下降可以抵消逆全球化造成的成本上升,从而维持产品竞争力;二是逆全球化产品的竞争性或替代性产品的生产也要同步转向逆全球化,才能使得逆全球化产品才不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前提条件很难存在,因而长期的逆全球化是有难度的。保护主义可能在短期内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冲击,但是不会持久。

四、全球化进入新常态

2016年12月,IMF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置全球化"的文章。作者的基本观点也是不认同逆全球化,而是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被叠加上太多的程序和任务,不堪重负,需要重新设置全球化,以便顺利地运行下去。作者认为此前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超调状态,而国际投资和贸易5%左右的增长更可能是一种值得期待的适度水平,也就是说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也许才是恰如其是的新常态。

就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一般也被认为是结构性因素要大于需求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又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随着经济发展,服务占比越来越大,而服务贸易的收入弹性又小于货物贸易,所以总贸易的收入弹性不断下降,GDP增长对贸易增长的拉动力就会减弱;其次是全球化红利的衰减,主要表现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后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影响已经常态化,增长率出现下降;最后,全球价值链扩张给国际贸易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渐下降。其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贸易全球化的停滞恰恰反映了全球化作用和影响得到了充分发挥。

所以,与其说当前出现了逆全球化,不如说是全球化正在改变,是全球化和整个世界经济不断走向成熟和稳定的新常态,而不是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

五、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应该看到,当前全球化所出现的挑战恰恰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管控全球问题的能力落后于不断出现的复杂和紧迫的问题造成的。正如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城市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向往田园生活就因此否定城市化一样。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如何管理全球化的进程以及随之产生的问题。

从国际角度看,全球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单纯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是不够的,更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全球问题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各国又有不同的诉求,要协调一致就必须有足够

的诚意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要解决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出路不是退回贸易保护主义。要相信理论和历史,要正视全球化高速推进中出现的问题,要强化全球治理,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最终需要各国政府的共识、勇气和决心,通过全球化来治理全球化。

新时代世界经济新趋势及对策

贺力平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主要大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新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使得当今的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仍然在继续,但是各国参与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全球化正面临走向升级版的严重挑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面貌还将会有新景象。我们可以从国际贸易增长、经常账户平衡、国际投资流动以及各国实际利率等多个指标的变动来观察和认知这些变化。

第一,国际贸易增速趋缓。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1980~2007年期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世界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3.53%,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09%,后者比前者高出2.56个百分点。如果从冷战结束的1991年算起,世界 GDP 年平均增长率在1991~2007年期间为3.74%,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96%,后者比前者高出3.22个百分点。但在2008~2017年期间,这种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在这个时期,世界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3.33%,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7%,后者比前者低了0.16个百分点。

导致国际贸易增长趋缓的直接基本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减速。各国产出的减速是对外需求减速的直接基本原因,后者又进一步引起各国对外出口的减速。

第二,全球经济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的指标有所改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社会广泛谈论"全球经济不平衡",并以若干大型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CA)与其GDP的比率来度量。以美国为例,1991年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为0.05%,2007年经常账户逆差与GDP比率却高达-4.91%。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在2007年也高达9.89%。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个别国家外,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平衡(失衡)与GDP的比率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下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GDP比率在2016年和2017年下降到2.38%~2.42%区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则下降到1.4%~1.7%的水平。

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的降低意味着从流量指标上看,各国对外部资金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资金市场对各国贸易增长的支持相对减弱。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增速相对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按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的统计,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贡献了近1.3万亿美元。但自那以来,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很少超过1.5万亿美元,仅在2015年恢复到略超过1.9

《世界经济研究》2018 年第 3 期 · 21 ·

万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最高年份 2015 年仅为 1.1 万亿美元稍多,未恢复到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 (ODI)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 2007 年仅有 250 亿美元,其中多数流向资源充足国的矿产地。到 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高达近 1500 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流通的趋缓,反映了产出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减速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以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传统类型的直接投资机会在逐渐消退。

第四,实际利率在许多经济体出现了下降趋势或者长久地处于低水平状态。人们通常使用金融市场流行的拆借利率减去一国通货膨胀率(CPI、PPI 或 GDP 平减指数)来表示实际利率。已有许多估算表明,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实际利率一直处于低位。这不仅源于那里的货币当局实行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而且更重要地是源于通货膨胀的低下。导致低通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产出增长率趋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工市场弹性的增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供给能力的扩大以及发达经济体减少了对传统能源进口的需求,等等。以互联网运用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进步虽然创造了许多新商机,但是,各国市场的分散性以及模仿者的普及也快速地降低了新技术进步的收益集中效应,从而也未能有效持久地提升投资回报率。

一方面,信息技术等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处于低位,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最可能得到温和增长。这也意味着,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平均增长率 3.74% 将很难再现。那个水平现在可以说是高增长率了,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标志之一,也是那个时代世界市场外延性和内生性扩大的结果之一。未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内生性技术进步。

第五,世界各大板块经济增长趋势互有差别,经济政策调整复杂多样。在1991~2007年期间,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68%,发展中经济体为5%,后者比前者高了2.32个百分点。在2008~2017年期间,发达经济体GDP平均增长率下滑到1.22%,发展中经济体则上升至5.08%,后者比前者超出3.86百分点。但是,若看最近四年(2014~2017年),发达经济体GDP平均增长率为2.03%,发展中经济体为4.48%,后者比前者仅多2.45个百分点。中国在1991~2007年期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六年(2008~2013年)中是支撑发展中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角。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经验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得到普及和应用,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驱动力的减弱,未来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依靠内部市场。

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内部市场的对外开放、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外包和外流、大宗商品国际需求的强劲增长等因素,那么,未来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都将或大或小地弱化或转向。尤其在未来全球化的政策规则和多边关系前景方面,各种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增多。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在谋求从现有国际经贸关系调整中得到新利益,或者促使他国做出让步。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是迈向升级版的挑战。

我国选择对策的原则应是:一是坚持发展国内市场为主的思路,不应过多指望外部市场需求对国内 经济的拉动作用;二是更多地为国内经济基于效率提升和持续性内生技术进步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体 制条件,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市场扭曲,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提升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三 是积极探索国际多边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升级版",与支持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良性互动,为未来全球化 的顺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条件具备,战略正确,全球化 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

张二震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早在2004年,年近90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撰文,对中国出口增加、挤占了美国的就业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大于"生产率的差距"的时候,自由贸易也许(对发达国家)是有害的,从而为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保护提供理论依据。由于萨缪尔森的巨大影响力,其代表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后进国家利益的反全球化观点,成为当时"反全球化浪潮"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当时发达经济体"反全球化"思潮还没有形成气候的话,那么目前发达经济体"逆全球化"的认知和政策已经成为现实。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甚至扬言要退出 WTO,发达经济体纷纷转向保护主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贸易,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成为时下国际经济中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是国际环境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二次大战后,殖民体系瓦解,发展中国家走上了独立自主发展本国经济的道路,国际关系相对平等。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享有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 等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了经济全球化所必须的规则、治理机制和体系,国际经济秩序相对合理。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剥削体系,国际贸易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没有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再三申明,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而一些发达经济体对多边贸易体制很不满意,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全球化的分工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产品价值链被分解了,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生产国际化成为常态,各国不是以产品优势而是以要素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要素分工和合作条件下,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门槛,使得原本不具备生产"整机产品"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发挥廉价优质要素优势,专业化于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甚至进入高科技行业的特定环节,获得产业发展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外溢效应和学习效应获取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还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

三是全球经济处于产业和技术革命的交替期。对发达国家来说,信息技术革命导致的增长长周期正处于下降期,而对于诸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尚未走完前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创新的完整生命周期,仍然存在着继续摘取全球现有产业和技术"高悬果实"的错位发展战略机遇。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全球处于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的孕育期,进而促使全球要素分工向全球创新链等方向发展变化,这无疑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其中实现开拓性技术进步,在攀升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制高点过程中实现"弯

道超车",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

在以前以产业和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条件下,以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虽然也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些"比较利益",但在总体上则对于发达工业化国家更为有利。本轮全球化以要素流动为本质特征,国际分工深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发达经济体转向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就不是很难理解的了。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采取合乎世界潮流、符合本国国情的开放战略。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动荡和贫困中挣扎。

一是政治稳定。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也是利用全球化机遇的条件。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北京大学姚洋教授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打破了旧有的社会等级结构,造就了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新社会,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党演变为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采取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成功地保持了政治稳定。

二是基本经济制度合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起来,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提供了制度基础。既坚持发展道路的自主性,又积极融入全球化发展体系。

三是完善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在极其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工业化人才,为对外开放、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起飞奠定了产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托丰富廉价劳动力等低端要素形成的低成本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创造了开放促进发展的经济奇迹,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在为世界提供优质廉价产品的同时,完成了中国式的"原始资本积累"。

四是采取了正确的开放战略。与体制改革相类似,中国的对外开放走的也是一条"渐进"的道路, "边学边干",积累经验,不断适时调整开放领域、开放地域和开放层次。这种渐进性的开放和分工调整,限制了风险范围,保障了国际分工利益,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使我们能够抵御突发性的外部冲击,避免了开放和分工调整中系统崩溃的风险。

总之,条件具备,战略正确,本轮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的发展对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的智慧和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张 薇)